

# 重审嬉皮士运动：《雷切尔文件》中查尔斯伦理选择的“突转”

## A Reexamination of the Hippie Movement: The Peripeteia of Charles' Ethical Choices in *The Rachel Papers*

郭国良（Guo Guoliang） 杜兰兰（Du Lanlan）

**内容摘要：**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嬉皮士运动渐显颓态，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在小说《雷切尔文件》中从伦理角度对其进行了重新审视。小说以十九岁的查尔斯·海威在父子关系和恋爱关系中的伦理选择作为叙事线索，通过聚焦其伦理选择中的“突转”来透视青年一代在嬉皮士狂热消退之后的自我认识和道德反思，再现了青年一代在“自由”、“理想”和“反英雄”等问题上的觉悟历程。小说也由此肯定了伦理选择对于青年一代的特殊意义，以开放式结局暗示他们在“突转”之后仍将面临种种艰难的伦理选择，同时也对他们在伦理选择中能够获得的成长寄予期待。

**关键词：**马丁·艾米斯；《雷切尔文件》；伦理选择；突转；嬉皮士运动

**作者简介：**郭国良，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英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杜兰兰，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英国文学研究。

**Title:** A Reexamination of the Hippie Movement: The Peripeteia of Charles' Ethical Choices in *The Rachel Papers*

**Abstract:** In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the hippie movement began to show signs of decline, which Martin Amis reexamined from an ethical point of view in his novel *The Rachel Papers*. The novel takes 19-year-old Charles Highway's ethical choices in father-son relationship and love relationship as the narrative clues, and the "peripeteia" of his ethical choices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s progressive self-knowledge and moral reflection during the waning of the hippie craze. It depicts the young generation's gradual awareness of their ignorance of "freedom", "ideals" and "antiheroes", and highlights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ethical choices to the youth. In its open ending, the novel anticipates more difficult ethical choices the young generation will inevitably face after the "peripeteia" and

also promising developments they can get by making these ethical choices.

**Keywords:** Martin Amis; *The Rachel Papers*; ethical choice; peripeteia; the Hippie Movement

**Authors:** **Guo Guoliang**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 guoliangguo88@163.com); **Du Lanlan**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dulanlan0309@163.com).

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作为战后青年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表达了年轻人打破现实束缚、追求理想生活的美好愿望。但是这场运动在中后期逐渐偏离了它的初衷,对自由的向往演变为混乱,对性爱的表达演变为纵欲,对精神的解放演变为滥用毒品,对主流文化的抗议演变为暴力冲突和内部分化。70年代,这一运动进入尾声,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以更加冷静的态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英国当代作家马丁·艾米斯正是其中之一。在其处女作、毛姆文学奖获奖小说《雷切尔文件》(*The Rachel Papers*, 1973)中他刻画了嬉皮士运动影响下的英国社会生活场景,塑造了一个在恋爱中历经激情、疯狂之后逐渐产生怀疑和失望、最终归于平淡的年轻人查尔斯·海威的形象,以此作为整个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社会状况和青年群体状态的缩影,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艾米斯显然将查尔斯的状况定义为他这一代的通病,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Brooks 10)。然而该小说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针砭时弊,还在于它为重审嬉皮士运动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伦理视角。小说以查尔斯的两个伦理选择作为贯穿始终的两条叙事线索,从伦理现象入手来解析文化问题,因而其思想深度得以超越社会批判而直达人类道德和灵魂层面。有鉴于此,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对该作品进行整体上的把握将有助于揭开其纷繁表象之下的深刻内涵。

### 一、历史的伦理现场:伦理选择的“突转”与自我的伦理“发现”

“伦理选择”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是人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途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的伦理化过程”(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80)。更具体地说,它“指的是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之后所要经历的获取人的本质的过程(……)经过伦理选择,人才有了善恶的观念,才有了人性,才最终成为伦理的人。因此,伦理选择是关于如何做人的选择,是人通过教诲和学习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过程”(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3)。因此,“伦理选择”

中天然蕴含着一种“方向性”和“变化性”。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经历的伦理化进程具有前进性，这是人类进化中不可阻挡的趋势。然而，每个具体的伦理选择过程因其选择主体和对象的特殊性、选择语境的复杂性，往往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文学，用伦理的观点解释处于不同时间段上的文学，从而解决在不同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理解文学时可能出现的巨大差异性”（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1），因此必须“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而不是“从今天的道德立场简单地对历史的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伦理选择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关照。

《雷切尔文件》正是关注到了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查尔斯在与父亲戈登、与女友雷切尔关系中所做出的两个伦理选择先后发生了出人意料的“突转”。正如小说中所说，“转折点，*cognitio* 或者 *anagnorisis* 和所谓的‘最低点’相比，其实也强不了多少”（马丁·艾米斯 143）<sup>1</sup>，这些“突转”使形势由盛转衰、急转直下，也使查尔斯暴露出他的道德缺陷。更重要的是，小说并未急于对这种“突转”行为进行批评，而是以查尔斯在二十岁生日即将到来的前夜回顾他在过去三个月所写下的日记的形式，还原了“突转”的伦理现场，回溯了“突转”从缘起到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查尔斯自我认识的转变，探讨了“突转”行为背后潜在的伦理价值。

人如何认识自我是伦理学的基本议题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就被苏格拉底用于论证美德对于人的重要性。他在与雅典贵族青年阿尔基比亚德的对话中清晰地展现了从“认识你自己”到“认识你自己的灵魂”再到“培养你自己的美德”的逻辑推演。他首先设法使阿尔基比亚德领悟到人只有先认识自己，才能避免失败，又因为“人除了是他的灵魂，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柏拉图 473），所以“我们应当认识我们自己，这条戒命的意思是：我们应当认识我们的灵魂”（柏拉图 474）。在取得共识之后，苏格拉底进一步指出“如果灵魂要认识它自己，它必须看着灵魂，尤其是看那个能使灵魂良好地产生智慧的区域，看其他与灵魂相同的東西”（柏拉图 477-478）。在此基础上，苏格拉底得出结论：“认识你自己”的途径就是要看到“发生认识和理解”的神圣的地方（柏拉图 478），即通过审视自己对万事万物和他人的认识，人才能够辨别好坏并懂得“自制”（柏拉图 481），最终获得使自己更加成功的美德。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的解读可以说开启了西方哲学对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进行伦理学探源和追问的传统。

1 本文有关《雷切尔文件》的引文均出自 马丁·艾米斯：《雷切尔文件》，李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在《雷切尔文件》中，“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命题被演绎为查尔斯的自我“发现”。苏格拉底根据人对自我的认识程度将“不懂的人”分为“知道自己不懂的人”、“不知道自己不懂的人”、“不知道自己不懂但认为自己懂的人”，其中最后一类人是“犯错误的人”，我们行动中的错误都是由这种无知所引起（柏拉图 453-454），因此这种无知是“一种最可耻的愚蠢”（柏拉图 454）。但是苏格拉底也承认人对自我的认识是一个从“不懂”到“懂”的渐进的过程：“在过去某个时候，你不懂你现在懂得的事情”（柏拉图 435）。而获得自我认识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有人教你”；二是“自己发现”（柏拉图 440）。在《雷切尔文件》中，第一条途径被暂时切断了：查尔斯在伦敦求学的经历被描绘成一出闹剧，唯一想要与他进行精神交流的教师贝拉米先生只得到查尔斯的讥讽和蔑视。因此，查尔斯的自我认识主要是通过“自己发现”。他和与苏格拉底对话的青年阿尔基比亚德一样，都是不知道自己不懂但认为自己懂的人，阿尔基比亚德在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下终于发现自己对“公正”的无知，而查尔斯在与自我的对话中终于发现自己对“自由”、“理想”和“反英雄”的无知以及“自制”作为一种美德的意义所在。

正是这些内部的伦理“发现”最终促使查尔斯在进行伦理选择时发生“突转”。亚里士多德将戏剧中的“突转”定义为“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将“发现”定义为“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亚里士多德 43），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此前彼后”或“互为因果”（亚里士多德 42）的关系。在《雷切尔文件》中，查尔斯伦理选择的“突转”发生于他的伦理“发现”之后，是他的伦理“发现”之果。从向内发现自我到向外重审嬉皮士运动，再到伦理选择的“突转”，小说将查尔斯伦理认知的渐变外化为戏剧性的伦理行动的突转，由此揭示了嬉皮士运动后期青年一代的道德反思和心灵震撼。

## 二、仇恨、反抗与“突转”：父子关系中查尔斯的伦理选择

小说中查尔斯面临的第一个伦理选择来自于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查尔斯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戈登为他提供了优渥的生活条件。然而，查尔斯直言自己对父亲怀有仇恨，甚至“真想拿起手头任何东西打那个混蛋”（67），但他并未说明这种仇恨的具体原因，而是将其归结为“只是对枯燥无味的家庭环境做出的情绪上的反应”，因为“现如今，一个小伙子总得有点什么东西激发他的热情”（6）。事实上，查尔斯之所以选择将“仇恨”作为他与父亲之间伦理关系的感情基调，至少存在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父亲戈登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威严。他对待查尔斯像对待自己的下属，仅允许查尔斯每周日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进入他的书房“商量事情、请求帮助或者鸣冤叫屈”（4）。即使在查尔斯动身前往伦敦的临别之际，他的言谈中也透露着“敌意”和“冷淡”，他奚落查尔斯的物品是“破烂玩意

儿”（4），对其考上牛津大学的理想也不屑一顾。这样的父子相处模式令查尔斯心生怨恨。他发现父亲尤其热衷于保养身体，“满脑子想的都是延年益寿的事”（7），因此他反抗父亲的方式就是选择被中产阶级认为“对身体有害”（7）的生活方式，参加嬉皮士派对，模仿“嬉皮士的吸法”（53）抽大麻烟、沉溺于致幻剂和性乱交组成的世界中。查尔斯的这种选择不乏幼稚荒唐之处，然而正如学者詹姆斯·迪德里克所说：“查尔斯最私密的思想和行为从来都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因为它们是由一种文化逻辑所塑造的，这种文化逻辑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Diedrick 22），查尔斯对父亲的仇恨实际指向了战后英国社会不断涌现的青年文化潮流与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英国文化学者认为前者是“存在于某个更大的文化网络中的具有更小的、更本地化和差异化结构的子集”，因此又称其为“亚文化”或“次文化”（subculture），而其所属的文化被称为“父文化”或“家长文化”（parent culture）（Clarke, John,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and Brian Roberts 6）。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父与子”的伦理关系。一方面，如同查尔斯和父亲在血缘和生活空间上存在无可否认的联结，“亚文化”和“父文化”也产生于同一社会中，具有某些相同的物质环境和历史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彼此的文化。另一方面，正如父亲和查尔斯在家庭秩序中居于不同地位，“父文化”和“亚文化”在文化权力的范围内也存在一种统治和从属的等级差异。这种差异带来的不平等促使亚文化的拥护者像查尔斯一样选择了反抗的道路。嬉皮士运动正是这种选择的极端表现，它选择通过抛弃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价值观体系来瓦解“父文化”的专制地位，为此“它拒绝对真理和理性主义，拒绝接受各种形式的精神信仰，拒绝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背离了人际关系和生活安排的文化规范”（MacFarlane 4）。嬉皮士的这种集体选择与查尔斯的个人选择一样，本质上都是对“父文化”伦理地位的挑战和对父权的争夺。

其次，正如学者柯克·克纳特（Kirk Curnutt）所观察到的那样：“整个20世纪70年代，青少年对社会权威的反抗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然而，在同时代小说中，年轻人的叛逆倾向并不是由于成人权威的压制，而是由于成人权威的缺乏”（Curnutt 95），查尔斯对父亲的仇恨还源于后者在家庭伦理责任中的缺席。父亲表面上与母亲相敬如宾，但是在外早已有了情妇，他与母亲的婚姻只不过是维持其良好名誉和形象的幌子。查尔斯目睹母亲为家庭所做出的牺牲、听闻母亲所受到的屈辱，同时不断感受到父亲伦理责任的缺失：“为什么周末他本该和家人待在一起，却常常突然之间、义无反顾地去陪别的孩子”（8）。小说中的这些情节折射出西方传统社会在社区、教会、学校、家庭等机构和场所中树立的道德权威在战后暴露出种种缺陷，无法继续发挥有效的规范和表率作用，青年一代随之对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产生质疑。因此有批评者认为“查尔斯体现了20世纪晚期个体发现自己正在超越性的道德权



威的缺失中挣扎的过程”（Brooks 21）。在这种挣扎中，查尔斯受到时代潮流的鼓舞，做出了揭发父亲不道德行为、向父亲宣战的伦理选择，例如他对父亲的情妇出言不逊，以教育弟弟为借口直指父亲中产阶级道德观的虚伪性，在日记中指控父亲为“背叛妻子”、“玩弄女性”的“老色鬼”（129），并暗中写下一封“声讨父亲的檄文”（122）。可以预料到的是，这极有可能导致他作为儿子的伦理身份的瓦解和他与父亲之间伦理关系的决裂。

然而小说中查尔斯最终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回归中产阶级家庭的道路。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查尔斯带着已经完成的《致父亲的信》走进书房，却在与父亲短暂对峙后承认父亲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221），并在离开后将信扔进了废纸篓。查尔斯所有的仇恨在这一刻“突然”烟消云散。这样一种看似陡然“突转”显然不是仅凭最后父亲寥寥数语的说服力就能够产生的，小说引导读者返回到文本中对潜藏的细节进行挖掘：查尔斯这一伦理选择的“突转”背后究竟隐藏着他在自我认识上的怎样一种发现和改变？

这种自我的发现首先表现为查尔斯在思想上对青年文化运动所宣扬的关于“自由”的新理念产生了动摇。导火线是家庭聚会上牛津大学教授赫伯特和记者威利就青年问题所发生的一次争论。赫伯特对青年文化运动中的激进行为大加赞赏，查尔斯也随声附和，发表了一番自以为是的演讲。然而威利一语中的：“你难道不认为人既需要自我表现，又需要自我克制，包括情感、欲望的自我压抑吗？”（131）威利指明了人在做出选择时所应考虑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这既让赫伯特无言以对，也让查尔斯陷入到自我的拷问中。小说通过描写查尔斯的身体反应使读者间接感受到这一事件对他造成的巨大冲击：“又是一个无法安眠的夜晚。我的床像过山车，脑子就像线路混乱的接线总机（……）心灵之眼仿佛戴了一副隐形眼镜，看到的都是以密码形式出现的符号（……）我看书一直到早晨七点（……）浑身刺痛，像被人剥了皮”（131-132）。小说以这种隐晦的手法展现了查尔斯在思想上的“脱胎换骨”。因此，最后在书房中，当父亲谈及与母亲的婚姻时提到：“任何长期的关系都需要相互妥协让步”（221），查尔斯并未和往常一样感觉到虚伪和愤怒，而是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因为他已经开始觉察到“年轻人最容易癫癫狂狂做出的错事之一就是，总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压迫他去破坏，去颠覆，去嘲笑老年人瞻前顾后，自己做什么事情也不愿意妥协”（221）。小说借此展示了青年一代如何通过痛苦的自我否定完成自我认识上的升华，进而调整自我伦理选择方向的过程。

除此以外，查尔斯还发现自己无法真正摆脱对阶级上升的追求，因此无法摆脱对父亲所提供的物质和社会资源的依赖。他一心要考牛津大学，但正如父亲所说，这只是“蛋糕上面那层酥皮”（4），他真正的野心是有朝一日在批评界成为与利维斯、特里林等著名学者比肩的“查尔斯·海威爵士教授”（95）。“爵士”一说源于现代英国的授勋和嘉奖制度。自1917年乔治五世

时期开始，英国皇室每年会在平民中选拔对国家和社会或某一专业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由国王颁发不列颠帝国勋章，其中的佼佼者更会被授予“爵士”头衔。在阶级社会中，勋章和头衔不仅代表着荣誉，还被看作是进入上流社会的标志。查尔斯视其为成功的象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情节与1965年嬉皮士精神领袖、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成员约翰·列侬为了反对英国政府干涉尼日利亚内政以及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沆瀣一气而公然退回勋章的举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小说对查尔斯受名利牵绊、无法获得自由的刻画还隐藏在一个意象之中。查尔斯常向父亲和他的情妇瓦妮莎居住的公寓打匿名电话，以捉弄他们为乐。在牛津大学面试之前，查尔斯又给父亲打去电话，但是这次的目的却是想从父亲那里打探他的考试成绩，并通过瓦妮莎了解面试官的情况。因此，查尔斯最终选择了将“电话”用作他谋求名利的工具而非反抗父亲的武器，这也预示着他在父子关系中的伦理选择将发生“突转”。当查尔斯最后在书房中对自己能否获得牛津大学奖学金表示担忧时，父亲许诺“可以给老赫伯特爵士打个电话”（220），他对父亲的仇恨情绪和反抗意志立刻土崩瓦解。此时查尔斯的伦理选择正是对嬉皮士运动后期大批青年认识到自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选择重返主流社会的真实写照。

由此，查尔斯发现了自己在“自由”理念上的无知：一方面，他对“自由”的理解是自私的；另一方面，他对“自由”的追求是虚假的。这种发现使得他在父子关系中的伦理选择发生突转：他对父亲的态度从长期的仇恨、对抗转向认同与和解。小说对这一“突转”并没有进行简单的“好”或“坏”的道德判断，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的起点。小说结尾处，查尔斯陷入思考：“我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224）查尔斯是否会在选择回归中产阶级家庭后再次选择逃离？小说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用了一个查尔斯给钢笔灌满墨水、继续进行写作的意象来隐喻一种“待选择”的状态。这也预示着青年一代只有在不断的伦理选择以及相伴而生的伦理思考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获得成长。

### 三、理想主义与“突转”：恋爱关系中查尔斯的伦理选择

除了父子关系的演变以外，查尔斯与雷切尔之间恋情的发展也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叙事线索。小说中，两人历经波折终于确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查尔斯也做出了不再到处寻欢作乐的伦理选择，因为那些都只是“随便玩儿”，只有雷切尔是他的“初恋”（175）。然而和父子关系中查尔斯的伦理选择发生了“突转”一样，查尔斯的这一选择随后也发生了“突然”的转变：他一边与旧情人格洛丽亚偷情，一边挑逗旧时伙伴科科，最终宁愿受到始乱终弃的道德指控、承认自己是“懦夫、臭狗屎、不诚实的人”，也要写下宣布分手的“给雷切尔的信”（217）。对此，艾米斯在小说中借查尔斯之口用现代喜剧的进化来加以解释：“关于结构，自从莎士比亚时代，喜剧有了很大的

发展（……）最后的接吻不再有什么象征意义，其乐融融的婚礼也不再是终成眷属、心满意足的画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越来越超越了总是令人鼓舞的前景，看到的都是变坏了的关系、结果”（151）。然而事实上，这种“突转”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创作手法上的革新，它还指向了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经验和认知上发生的改变。正如加文·基尔克斯所说，它是“一种复杂的混合形式，一种更有利于后现代不稳定性的修正主义模式”（Keulks 128），它将“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尾突然逆转成“变坏了的关系、结果”，旨在打破读者的幻梦、使他们认识到艺术的虚构性以及现实的多变性和不可预料性，进而发现自己的无知。具体到《雷切尔文件》中，在嬉皮士运动的背景下，查尔斯与雷切尔爱情的“突转”指向的是嬉皮士运动后期理想主义的幻灭，以及由此引发的年轻一代对自我理想的检视。

学者蒂莫西·米勒曾对早期嬉皮士的理想主义进行详细论述。早期嬉皮士被称为“爱的一代，他们是和平、甜蜜、鲜花、光明、乐观一族”（Miller 88），然而米勒指出，尽管在他们看来，“爱是解决困扰世界的众多问题的唯一答案。实践爱是人类社会的唯一途径，是真正解决这个世界上看似棘手的疾病的唯一途径”，但实际上“嬉皮士很难实现完美的爱。毕竟他们也是人，是有缺陷的”（Miller 89）。嬉皮士“爱之夏”运动的衰落正印证了这一点。1967年夏天，大约十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涌入美国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利和金门公园，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艺术狂欢。他们高喊“爱与和平”，尽情享受摇滚乐队的演出，然而很快就暴露出过度商业化、高犯罪率、毒品交易等问题。两年后在美国加州奥塔蒙特举行的滚石乐队演唱会上，观众中不断出现打斗，随着一位年轻黑人被负责安保工作的“地狱天使”党刺死，“爱之夏”终于走到尽头。1973年，嬉皮士们以一场声势浩大的“爱之夏之死”游行宣告了运动的失败，也正是在这一年，《雷切尔文件》在英国出版。

与现实中嬉皮士理想主义的挫败相呼应，《雷切尔文件》也展现了青年人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发现自我对“理想”的无知。雷切尔是查尔斯“理想”的化身。她举止稳重优雅，父亲是巴黎画家，还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她的美国男友的存在更使她显得高不可攀。然而，在与雷切尔的交往中，查尔斯逐渐发现雷切尔见解平庸、头脑愚钝，对布莱克诗作的奥妙一无所知却对格雷诗中“保守的陈词滥调”（75）兴致盎然，对女性解放和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的认识也很浅薄，就连所谓的“画家父亲”也只不过是雷切尔为了虚荣而编造出的谎言。查尔斯不得不承认她“看起来很迷人，只是没有内涵，没有重量”（180）。然而小说对这种失望情绪并没有进行过多渲染，查尔斯对雷切尔的心理落差只是隐隐散落在字里行间，直到两人关系到达顶峰——期盼中的同居的“美好的时光”（169），艾米斯才最终昭示出查尔斯爱情理想主义的幻灭，一如嬉皮士运动在发展时期已经显露出种种问题的迹象却不为人所察觉，最终在集体的狂欢高潮中戛然而止。



查尔斯声称他在与雷切尔同居的几天时间里发现了“三件重要的事情”（181）：雷切尔内裤上沾有污秽、雷切尔出于焦虑而尿床和雷切尔鼻子上长出了几个“小疙瘩”。这些发现使他无法忍受，进而选择与雷切尔分手。这种看似荒诞的“突转”只不过是查尔斯在前述一系列“发现”的累积之下产生的心理渐变的结果，是查尔斯爱情理想主义幻灭、觉悟到自我的无知的最终表现。与现实中具有表演性质的嬉皮士死亡大游行一样，艾米斯也采用了这种戏剧化的方式作为向理想主义和无知的自我告别的仪式。

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其他细节也隐含了对查尔斯理想主义幻灭的暗示，如查尔斯为了追求雷切尔而特意编写了一份详细的“雷切尔文件”作为行动指南，然而当他将文件中的方法付诸行践时，却发现总是事与愿违；又如查尔斯跟随雷切尔去探望里斯大妈，目睹了工人阶级生活环境的窘迫后，“心里充满清教徒式的内疚”，却又深感“对社会制度本身无能为力”（83）；再如查尔斯在家庭聚会结束后带雷切尔来到屋前的小树林，想要找寻“童年的时光”（133），却只发现灌木丛中充斥着不堪入目的垃圾，只得悻悻而归。事实上，小说从开头部分查尔斯的自我介绍开始就弥漫着一种“名不符实”的失望情绪。“形容憔悴的嬉皮士被查出过量吸毒；凶蛮的搭顺风车之流会揪下生活动荡不安的同性恋者的帽子、花冠，又十分凶残地踩在脚底”（2），艾米斯用戏谑的语言传达出嬉皮士运动后期理想主义的幻灭给人带来的痛苦和无力感，也讽刺了理想主义者永远无法抵达的乌托邦幻境。

小说中查尔斯最终选择与雷切尔分手，转而投向远在异国的科科。然而查尔斯对科科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两年前的一次浪漫回忆，他对科科信中提到关于未来的“也许之国”（60）产生好奇，寄希望于在科科这里延续他在雷切尔处破灭的理想主义，因此，查尔斯爱情的“突转”也转向了一种“悬而未决”。小说结尾处用查尔斯小说中人物“下巴上那个几乎看不见的小包”（225）暗示了多种可能性的存在。那到底是不祥的疾病前兆还是青春期的荷尔蒙使然？这种对确定性的搁置与拖延再一次发出了青年一代未来仍将面临诸多伦理选择并在其中经受磨炼的预言。

#### 四、诺尔曼“反英雄”形象的倒塌与查尔斯伦理选择的“突转”

在查尔斯两次伦理选择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诱因，即查尔斯通过对姐夫诺尔曼形象的建构、解构和重构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从而进一步冷却了自我对于青年文化运动的盲目冲动和热情。如果说父亲和雷切尔主要通过引发查尔斯对“自由”和“理想”等抽象概念的思考来促使他发现自我的伦理缺失，诺尔曼则为查尔斯提供了一双通过看见他人来照见自己的一双“瞳孔”。

“瞳孔”是苏格拉底向阿尔基比亚德解释如何“认识你自己”时所使用的一个比喻。苏格拉底指出：“当一个人看着一只眼睛的时候，他的脸也在

眼睛中显现，就像看着一面镜子。我们称它为‘瞳孔’，因为它是看着它的这个人的小模型”，因此，“如果一只眼睛要看它自身，它必须看一只眼睛”、“如果灵魂要认识它自己，它必须看着灵魂”（柏拉图 477）。“瞳孔”之喻指明了认识过程中他人对自我的映射作用：人对他人的判断和评价最终反映和投射出的是真实的自我，换言之，人对他人的认识可以帮助人形成对自我的认识。在《雷切尔文件》中，查尔斯对诺尔曼的认识就使他发现自我对“反英雄”的无知。

“反英雄”（anti-hero）与“英雄”（hero）相对，“标志着个人主义思想的张扬、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微和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质疑”（王岚 46）。他们地位低下，“带有琐碎的生存焦虑”、“通常具有身体缺陷”，“日常生活充满怪诞和混乱”（Furst, Lilian R. and James D. Wilson 6），然而他们往往将反叛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仍然具有令人钦佩的要素。“反英雄”崛起于现代社会，在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后，人们对“英雄理想”（the heroic ideal）丧失了信心，他们选择“反英雄”作为他们“对于 20 世纪的意识中心”，认为它“推动了与这个世纪有关的激进的视野，以及反讽、秩序和极度的绝望”（Hassan 55）。其中，嬉皮士精神无疑是二十世纪“反英雄”气质的集中体现。嬉皮士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对民权的争取、对反战的呼吁、对资本主义的抵制等融合在一起，同时具备了不被当时主流承认和自身具有正当性这样两大“反英雄”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20 世纪 60 年代，宣扬英雄主义的文学形式被认为已经过时，“悲剧（在战后时代）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体裁（……），取而代之的是形而上学的闹剧，一种古典悲剧与喜剧的现代混合体，这种体裁无法使用英雄”（Furst, Lilian R. and James D. Wilson 7）。以黑色幽默小说闻名的艾米斯显然深谙此道，并且给出了更加具体的阐述：“简而言之，文学的最初主人公是神；后来，他们成了半神；再后来，他们成了国王、将军、绝妙的情人，同时又是超人、凡人、大凡人；最终他们变成了普通人（……）如今，我们的主人公远低于他们的创造者：他们是反英雄、非英雄、次英雄”（Amis 17）。他在《雷切尔文件》中就首先假借查尔斯之手建构了诺尔曼这样一个极具时代气息的“反英雄”，进而对这一形象进行解构，最后在“利己主义者”的重构中完成了查尔斯自我认识的更新。

诺尔曼·恩特威斯尔来自下层阶级，他举止粗俗，缺少教育，因此受到戈登夫妇的鄙薄。查尔斯对其“反英雄”形象的建构主要基于自我对他者的不可靠想象。在查尔斯姐姐的婚礼上，父亲戈登羞辱了诺尔曼的家庭出身，查尔斯对诺尔曼的反应进行了听觉想象，先是“听见”诺尔曼“吓人的尖叫声”（39），继而“听见”诺尔曼反复朗诵一首粗俗的、充满挑衅之意的诗歌，间或“听见”稀稀拉拉的掌声，然后“听见”父亲愤而离席的脚步声和开门、关门声，最后“听见”诺尔曼哈哈大笑的胜利之声。此时在查尔斯的想象中，

诺尔曼俨然成为一个敢于反抗阶级偏见和主流价值观的斗士。再如查尔斯无意间“听”到姐姐怒斥诺尔曼为“刽子手”（54），他感到“很兴奋”（55），并据此对诺尔曼的政治立场做出种种揣测，将其想象为一个不惜采取极端行为表达政治观点的激进分子：“这里肯定有什么很危险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弄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63），诺尔曼的“反英雄”形象由此衍生出更多的面向。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查尔斯很快就发现“刽子手”之说不过是指诺尔曼要求姐姐堕胎，但他仍未放弃对诺尔曼“反英雄”形象的建构。他极力寻找诺尔曼要求堕胎的原因，试图证明诺尔曼只是崇尚自由、不想受到约束。当他最终得知诺尔曼此举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时，“反英雄”形象瞬间轰然倒塌，重构出来的是一个自私而又残忍的“利己主义者”。查尔斯投射在诺尔曼身上的“反英雄”情结被彻底粉碎，他感受到巨大的失落，同时也陷入到深深的自我怀疑中：“难道这就是他不想要孩子的唯一理由吗？我一直认为倘若这样，真是太令人作呕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真的。诺尔曼，那么狂放无羁，充满激情。难道我们都是这样容易激动、粗鲁的人吗？”（212）事实上，查尔斯的种种举动早已透露出他的“伪嬉皮士”精神和“真利己主义者”倾向。如他为妈妈和姐姐受家庭所累、无法实现个人价值而感到惋惜，在和雷切尔讨论女性问题时也摆出一副女性主义者的姿态，但他对妈妈、姐姐身体充满肉欲的描述以及他关于“性玩具”雷切尔的梦境无不显示出他对女性的物化。再如他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对各种经典侃侃而谈，然而他写下的评论文章不过是对“原材料”的抄袭、肢解和拼凑。正是诺尔曼“反英雄”形象的倒塌使他终于不再自欺欺人，接受自己作为利己主义者的“本来面目”（64），这也正是促使他在两次伦理选择中都进行“突转”的又一深层动因。

在小说最后，查尔斯参加了牛津大学的面试，面试官“真正的嬉皮士”诺德博士对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粗暴地”（216）对待文学的功利性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但诺德仍然接收查尔斯进入牛津大学，因为“如果我不收，别人也会收，那只能更糟”（216）。与此同时诺德警告他不要再玩弄文学，“只去读诗，然后弄明白你是否喜欢，为什么喜欢”（216）。正如查尔斯在两次伦理选择中的“突转”都指向一种不确定性，艾米斯在这里再一次同时留下了希望和悬念。查尔斯未来在牛津大学的伦理选择将决定他的道德走向，一如嬉皮士运动失败后青年一代所做出的伦理选择将关系到他们的价值观形塑。伦理选择由此成为青年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试金石、里程碑和转折点。

概而论之，艾米斯在《雷切尔文件》中回答了两个与伦理选择有关的问题，分别是“伦理选择突转的原因”和“伦理选择对于青年成长的意义”。

在第一个问题上,艾米斯以查尔斯在父子关系和恋爱关系中伦理选择的“突转”为叙事线索,以查尔斯对姐夫诺尔曼形象的建构、解构和重构为伦理选择“突转”的隐性进程,引导读者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对“突转”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挖掘,捕捉到查尔斯在认识自我的伦理进化过程中从“无知”到“知”、从“自以为懂”到“发现自己不懂”的变化轨迹。小说以此影射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中产阶级青年群体的境遇,展示出青年一代在嬉皮士运动中逐渐产生的道德反思和思想波动。在第二个问题上,小说指出伦理选择是青年获得成长的必由之路。在经历自我否定、自我调整的“突转”之后,青年一代仍将必须面对更多艰难的伦理选择,小说在对此不免感到担忧的同时也抱以期待,开放式的结尾为青年的未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彰显了艾米斯作为一名严肃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伦理关怀。在青年文化继续向多元化发展的今天,《雷切尔文件》中反映出来的青年的伦理选择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 Works Cited

- Amis, Martin. "Saul Bellow and the Moronic Inferno." *The Moronic Inferno and Other Visits to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1987.17-24.
- 马丁·艾米斯:《雷切尔文件》,李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 [Amis, Martin. *The Rachel Papers*. Trans. Li Ya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6.]
-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Aristotle. *The Poetics*. Trans. Luo Niansh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Brooks, Neil. "'My Heart Really Goes Out to Me': The Self-indulgent Highway to Adulthood in The Rachel Papers." *Martin Amis: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Ed. Gavin Keulk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9-21.
- Clarke, John,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and Brian Roberts.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Eds.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Oxon: Routledge, 2014. 3-59.
- Curnutt, Kirk. "Teenage Wasteland: Coming of Age Novel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ritique*, 43.1 (Fall 2001): 93-112.
- Diedrick, James. *Understanding Martin Amis*.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5.
- Furst, Lilian R. and James D. Wilson. "Editor's Comments."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Special Journal Issue) 9 (Spring 1976): 5-9.
- Hassan, Ihab. "The Anti-Hero in Modern British and American Fiction." *Rumors of Change*. Tuscaloosa: U of Alabama P, 1995. 55-67.
- Keulks, Gavin. *Father and Son: Kingsley Amis, Martin Amis, and the British Novel since 1950*.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2003.



- MacFarlane, Scott. *The Hippie Narrative: A Literary Perspective on the Counterculture*.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7.
- Miller, Timothy S. *The Hippies and American Values*. Knoxville: U of Tennessee P, 2011.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10 (2020): 71-92+205-206。
-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205-206.]
- 柏拉图: "阿尔基比亚德上篇", 《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下卷, 王晓朝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431-482页。
- [Plato. "Alcibiades I." *Collections of Plato (th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Volume II*. Trans. Wang Xiaocha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431-482.]
- 王岚: "反英雄", 《外国文学》4 (2005): 46-51。
- [Wang Lan. "Anti-hero." *Foreign Literature* 4 (2005): 46-51.]